

課程：中國戰略思想史
指導教授：施正權 博士
學生：苗 繼 德
日期：88年1月11日

鹽鐵論：明裏辯財經，暗中鬥政治

新君主如果不向被征服地區殖民，而是派遣駐軍，那麼花費將堪稱浩大，因為維持駐軍將會耗盡那個國家的全部收入，得不償失；而且由於軍隊到處調動，他將因為士兵們到處為非作歹而損害整個國家。對此，人人都會感到惱怒，結果將世人人都與君主為敵。他們雖然受著壓迫，但仍然守著自己的老家，因而是能夠危害的敵人。所以，無論如何，用士兵控制那個地方是無益的，殖民才是可取的。

-----馬基維里：君主論，頁 10-----

壹：前 言

就如同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憲法日誌（*The Debat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¹一般，這本《鹽鐵論》正代表了西漢時期的政策辯論的會議記錄，全書由西漢人桓寬主編而成，內容共分成六十篇，第一篇〈本議〉到第四十一篇〈取下〉是正式會議上的發言內容，第四十二篇〈擊之〉到第五十九篇〈大論〉又是另一場私下的辯論內容，最後一篇〈雜論〉則是作者的自著的後序，該次會議亦因此書而被稱為「鹽鐵會議」²。

西漢中葉（81B.C.），也就是漢昭帝始元六年時，大將軍霍光為了要「總論政治得失」，特別是指針對鹽鐵專賣為主的一些武帝時期所延續的政策，進行全面的辯論與評量是否將繼續執行下去。所以霍光召集了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

¹ 有關麥迪遜的《憲法日誌》內容見<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debates/>（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四日），而有關麥迪遜的政治思想見伯瑞（Leon P. Baradat）著，陳坤森、廖揆祥譯，政治意識型態與近代思潮（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六月），頁 123~129。

² 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導論頁 3~4，與陳再明著，古今人物逍遙遊：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三刷），頁 147。

羊及「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舉行這次政策討論會，也就是所謂的「鹽鐵會議」，宣帝時桓寬則將此次會議記錄寫為「鹽鐵論」一書³。

事實上，本次「鹽鐵會議」所要討論的問題，並非只有鹽鐵專賣政策而已，舉凡武帝時期為了增擴稅收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如平準法、均輸法、算緡（工商業品稅）、告緡、權酷、統一鑄錢等等，甚至進而將增稅政策的根本原因-----爭伐匈奴與否及儒法之爭也拿出來討論⁴。實際主持會議的是丞相田千秋、霍光並沒有出面，而與會者也分為兩派意見，分別是代表朝廷，主張維持武帝政經制度的桑弘羊，以及來自地方，主張將武帝時延續至今的政策更改或廢止的地方賢良、文學之士，他們各持己見，而所辯論的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部分，其也是整個鹽鐵會議的重點：

（一）、鹽鐵專賣問題：武帝在位時期，為了爭伐匈奴需要增加收入，在不增加田賦的前提下，重用商人之子桑弘羊以鹽鐵專賣、國家鑄錢、均輸、平準、算緡錢及增加丁稅口賦來增加國家稅收支用。此一系列經濟政策對於北伐匈奴及西域的物資供應，削弱打擊商人與諸侯國的經濟實力，鞏固財政及中央集權方面的確助益良多，但也因為負擔過重造成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變亂不斷。武帝晚年曾意識到此一危機，故下「輪台詔令」，招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欲恢復生產，與民休息，武帝死後，霍光輔政，雖仍遵循輪台詔令的精神，輕徭薄賦；但文學、賢良認為不罷鹽鐵酒權，不能解民間疾苦，長久以來，諸多經濟政策無異與民爭利，加上官吏假公濟私管理不善，至民煩苦之，桑弘羊以為鹽鐵專賣的實施不只是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建本抑末，打擊地方分裂勢力絕兼併之路，在面對當前政治局勢，該政策仍有續行之必要⁵。

（二）、對匈奴和戰問題：漢初面對匈奴的長期侵擾，多是容忍和親，至武帝時因修養已久國富兵強，遂行大規模反擊征伐，在桑弘羊認為如以賢良、文學之士那般全面否定北伐，主張以仁義感化，罷關梁，除塞障，偃兵休士，厚幣結和等措施是不切實際的迂腐之論，事實上，正如桑弘羊所言，以漢初時期為例，若一

³ 《鹽鐵論》並不是把鹽鐵會議原原本本記錄起來的紀錄文件，桓寬是根據鹽鐵會議的原始資料，用推衍和增廣的手法，加以整理組織，用對話體的方式，加以集合概括而成，見陳再明著，古今人物逍遙遊：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三刷），頁148，徐復觀著，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版），頁124~125與蕭公權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九年十月，第六次印行），頁290~291。

⁴ 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導論頁4。

⁵ 徐復觀著，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版），頁118~121。

味只以重金厚賂安撫那貪婪好戰的匈奴，是得不到長久的安定而終需一戰，但賢良、文學之士所警告長期征戰將引起農民變亂一事，也屬事實，所以暫時停興北伐之師，固守成果是必要的，但無論從學理與事實來看雙方顯然都過於偏激脫離現實。

(三)、法治與德治之爭：桑弘羊堅持武帝的「法治」政策，法家信仰者的他認為，只有「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奸禁」，嚴刑峻法才是鞏固統治的良方，但這似乎有違於武帝晚年「輪台詔令」中「禁苛暴」的精神，如此顯然已不合時宜，而賢良、文學所指，長久的酷刑鎮壓，會使漢步上秦朝那般迅速垮台的後塵，事實上已有大大小小的民變不斷發生，因而這種憂慮是有根據的，所以他們主張「德治」，先禮後法，對人民加強思想控制，是較為理想的作法，而由此點可以看出，從春秋戰國至秦漢時代的變革過程中，所謂「儒法之爭」的狀況一直都存在著，戰國與秦代皆以法家思想治國，至漢初雖名為道家無為而治，但實為法治，武帝獨尊儒術為表，而以法治國為實，但儒家所貴之德治卻也開始受到世人重視，至此中國歷史上正式形成「陽儒陰法」的統治規則，儒法開始合流。

本次會議的結果大部分是肯定了武帝時期的基本政策，但也因應現實的發展而做了一些調整，霍光下令罷去酒權，關內地區也停止鐵權，但其他經濟措施卻維持不變，所以鹽鐵專賣一直維持到新莽時代（元帝時曾一度停止），而匈奴也在昭帝十數年休養生息後，於宣帝時數度被擊破，至元帝時對漢稱臣，因而漢之邊患稍歇，儒學更為往後宣、元等帝所喜好，而得以發揚光大，終漢之前，皆為儒法合流的政治手段，間雜有陰陽家甚至墨家思想，更是早在武帝時便有之。

貳：重要人物介紹

一、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至前八十年），出生於一個洛陽商人的家庭中，對數字靈通強記，是一位數學天才，十三歲即入宮廷為侍中，故一向為封建士大夫所不恥，他從三十三歲起就參與和掌管中央財政事務近四十年，很成功的為當時封建王朝解決了十分沈重和緊迫的財政需求，而「民不加賦」，但《史記》與《漢書》都並沒有為之立傳，而《漢書·食貨志》雖記載桑弘羊之事，但都語焉不詳，現

今其思想言行只有從《鹽鐵論》一書中才能夠瞭解⁶，在會議中他是政府政策的維護者，故於會議中他幾乎是一人舌戰「群儒」。

二、霍光

他是爭伐匈奴有功的大將軍霍去病的弟弟，也是這次會議的幕後「黑手」，他想利用賢良、文學那一批人來反對政府的財政政策，以謀求擴大自己的勢力，若是沒有位居大將軍之位霍光的暗中幫助這次的會議是無法召開的，從會議後的事態發展來看，霍光只是一位貪求權力慾望的小人而已⁷，而在這次會議中霍光並沒有出席，他只在背後遙控會議的進行。

三、田千秋

又名車千秋，這是因為他晚年曾受到可乘小車入宮的特殊禮遇，他是有名的鄉愿，是一位好好先生，在這次會議上，這位位居丞相的鄉愿只無關痛癢的說了兩句話，因此桓寬描寫他「括囊不言」，實在是恰到好處⁸。

四、賢良、文學

所謂「文學」是一些有名學者的通稱，「賢良」則是被各地選為「賢良方正」的學者，他們都是儒家，其主要是代表民間、替商人和地主階級講話⁹，而參加這次會議的賢良、文學是前一年由昭帝發佈召令從全國各地薦舉而來的，文學來自各地方郡與各諸侯國，賢良則來自三輔地區和太常所管轄的縣¹⁰。

五、桓寬

⁶ 以上有關桑弘羊的生平介紹係作者整理下列書籍得來：薩孟武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增補六版），頁 194~202，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初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九月），頁 215~216，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導論頁 2 與陳再明著，古今人物逍遙遊：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三刷），頁 152。

⁷ 有關霍光的生平事蹟主要是參考陳再明著，古今人物逍遙遊：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三刷），頁 147~159 與徐復觀著，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版），頁 122~124 整理而成。

⁸ 有關田千秋的生平事蹟主要參考下列著作：陳再明著，古今人物逍遙遊：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三刷），頁 151~152 與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導論頁 1~2。

⁹ 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初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九月），頁 230~231。

¹⁰ 三輔地區是指京城長安及其附近地區，漢代將這一地區劃分為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個政區，合稱三輔。太常是中央九卿之一，掌宗廟禮儀，監管皇帝陵墓所在的縣，見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導論頁 3。

桓寬，字次公，西漢汝南人，漢宣帝時舉為郎，官至廬江大守臣。班固在《漢書·車千秋·贊》中說他學識淵博，有傑出的寫作才能，可見他具備撰寫《鹽鐵論》的個人條件，他研習春秋公羊傳，是一位正統儒生，思想觀念與參加會議的賢良、文學相契合，因此，他撰寫《鹽鐵論》，主觀態度上明顯偏於賢良、文學一方。他依據儒家的思想觀念擬定篇題，在大多數的篇題中以賢良與文學的發言為結尾，並在全書的最後一篇中直接站出來歌頌賢良、文學貶抑御史大夫、御史、丞相史。但是由於他依據會議的紀錄材料，採用對話錄形式，客觀的保存了雙方的發言，因此《鹽鐵論》一書還是能真實反應鹽鐵會議本來的面貌¹¹。

參：內容摘要

卷一：本卷主要是辯論到底何者是富國的根本，是農？亦或是商？

<本議>

此為全書之首篇，「本」即根本，「議」即討論，「本議」即是關於問題根本的討論，篇中所涉及的是這次鹽鐵會議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繼續執行武帝以來的政策亦或是改弦易轍，而圍繞這些問題賢良、文學與桑弘羊展開一場辯論。

文學們主張將鹽鐵官營等政策一概廢除，其立論依據在於：治理百姓，要用道德引導，不能以財利誘惑，鹽鐵官營政策是與民爭利，敗壞風氣；治理國家應以農業為本，抑制工商業，鹽鐵官營政策等措施激起人們逐利之心，使百姓「趨末者眾」，因而壞了農業生產，而在對待匈奴方面，應以仁德感化，以道德安撫，不應訴諸武力，今興兵圍戍，借鹽鐵官營等措施籌措經費，絕非良策，且百姓深受其苦。

桑弘羊卻認為，匈奴暴虐必須以武力相向，而實行鹽鐵官營等措施，是籌措軍費以抗其匈奴的必要措施，而治理國家工商業應與農業並重，且工商業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存在，實行這些政策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存在。

<力耕>

「力耕」就是努力耕種，這是文學的主張，本篇的辯論圍繞著三個問題而展開；

¹¹ 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導論頁4。

其一：大夫認為均輸的蓄積，倉庫的儲備，兼有備水患救荒災的作用；但文學則反駁說：「防備水旱災必須把立足點放在發展農耕以增加糧食儲備上，而不能靠別的」；其二：大夫認為大力展開與異域他國的貿易，可以促進財物內流，有強國富民削弱敵國的功能，但文學、賢良卻反對如此的說法；其三：大夫認為富國足民只有依靠商業，但文學卻指出以農為本的社會才可富強。

<通有>

「通有」即是互通有無，本篇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發展工商業，文學認為奢侈的生活是由工商業而來，因此堅決反對發展工商業，主張以農為本過著儉樸的生活；但大夫卻指出工商業可使貨暢其流，自古有之，且農商交易對農業工商業都有好處。

<錯幣>

本篇主要是談論貨幣鑄造權歸屬的問題，大夫認為如果任由民間私鑄的話將對國家造成莫大的損害，因此鑄幣權應歸屬中央，但文學不但反對鑄幣權歸於中央，也反對貨幣的使用，因貨幣其會使得社會上產生奢靡之風氣，還認為上古時代的以物易物是最好的，但如果要在官鑄與民鑄之間選擇，則其認為民鑄較好。

<禁耕>

本篇主要是討論鹽鐵官營與私營的問題，大夫認為如果讓鹽鐵私營的話則其對於國家將是莫大的危害，且鹽鐵私營會使市場的大商人「專其利」，因而獲得市場的操控權，從而嚴重的損害百姓，但文學卻以孔子「藏富於民」來作為鹽鐵私營的道理所在，他們認為鹽鐵官營嚴重損害百姓生計與農業的正常發展，因此主張鹽鐵私營。

<復古>

本篇主要在討論兩個問題，一是鹽鐵官營或私營的問題；其二是興兵征伐夷狄的問題，由於辯論雙方都找古代的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因此桓寬把此篇命名為「復古」。

卷二：雙方對於對方的「祖師爺」所做無情無理的批評

<非鞅>

本篇主要是從討論鹽鐵官營或私營的問題因而引伸出對於商鞅功過問題的討論，文學否定商鞅在秦國的一切所為，秦國只能維持十五年也是商鞅變法的原因，至於商鞅之死也是其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大夫則對商鞅的功過持較為肯定的態度，他的變法帶來了秦國的富強，也造成了秦國可以統一六國之舉，而其朝之滅亡在於趙高之弄權與商鞅無關，至於商鞅之死在於君主忘恩信讒；文學把一切問題均歸罪到商鞅身上是不公平的。

<晁錯>

本篇主要是談論晁錯的功過，大夫認為晁錯之死應歸罪於諸王之叛亂，文學卻以「人臣各死其主」來解釋晁錯之死，雖然雙方都肯定晁錯的作為，但對於叛亂責任的問題確有不一致的看法，大夫認為由於文學的唆使才使得這場叛亂開始，文學卻認為是諸王的野心才促使其叛亂。

<刺權>

刺權就是譏諷權貴，篇中文學對大發官營之財的權貴進行譴責，揭露他們假公濟私、專權橫行、驕奢淫恥的醜惡行徑，認為他們是無功而驕、無德而富，不符合君子為官的正道，並指出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意願，大夫則極力為達官貴人辯護，認為「官尊者祿厚」，位高者財多，富貴之家生活奢華，這些都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貧民百姓沒有資格與他們攀比。

<刺復>

本篇刺復就是文學們反擊大夫認為儒士是無用的，而指出儒士之無用是在於當權者的忌賢妒能，驕傲自大而並非是儒士無用。

<論儒>

本篇主要是針對評論儒家學派而展開，內容了無新意。

<憂邊>

此篇主要是討論到邊防的問題，因而爭論的焦點又回到鹽鐵官營等政策的問題上來，大夫認為邊防之不可廢，因此鹽鐵官營等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文學則認為「文德」才是治國之根本，而各項政策都是末道，因此主張廢止。

卷三：政府政策有效性的質疑

<園池>

此篇的辯論焦點在目前的國庫收支問題，大夫認為在實行鹽鐵專賣等政策之下，國庫仍感匱乏，因此堅決反對取消，文學則認為應從反對奢侈浪費，致力於耕織大業，將山川還給百姓，取消鹽鐵專賣等政策，莫與民爭利，則國家一定富強。

<輕重>

此篇只要是討論政府在經濟事物中的角色問題，御史對桑弘羊的政策多所讚揚，反之，文學則先從否定管仲之所作所為起，批評桑弘羊的鹽鐵官營等政策，而對於武帝的開疆拓土政策也毫不留情的攻擊，認為其不但沒有功效，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傷害。

<未通>

本篇只要是討論開疆拓土與賦稅繇役的問題，御史認為人民的貧困都是源於自身的不努力所造成，文學則認為由於對外征伐的太頻繁，造成了人民莫大的負擔，因而使得經濟凋蔽，人民貧困乃是上面的行為所造成。

卷四：從對外政策到個人德行的探討

<地廣>

此篇主要是針對武力征伐政策所展開的辯論，大夫認為以武力征伐主要是保邊境的平安，而文學則是反對這些看法，大夫卻以人身攻擊說：「貧賤之人，沒有資格談論國家大事」，文學則認為身處貧賤照樣會有傑出的德行，並點名當時各級官員致富之道是侵奪人民的財產。

<貧富>

此處是談論個人貧富的問題，內容主要是談論財富的獲取之道與財富與社會地位等問題。

<毀學>

本篇主要是以秦相李斯為中心，來討論追求富貴與安於貧賤兩種人生哲學的問題。

<褒賢>

此篇主要是雙方根據自我的標準對古今的人物「品頭論足」一番，而在文章中大夫重在「貶」，而賢良文學則重在「褒」。

卷五：個人操守與社會問題的探討

<相刺>

本篇大夫與賢良文學針對人才問題展開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

<殊路>

本篇的重點是老師的問題，兩方的辯論內容了無新意。

<頌賢>

本篇是針對評價幾位古時的儒生，大夫的重點在「貶」，而賢良、文學則在於「歌功頌德」。

<尊道>

此篇在辯論治國之道是否有百世不變之真理，文學、賢良認為「有」而大夫們則反對。

<論誹>

此篇主要是針對武帝時期的若干官員的言行而為的辯論，丞相史則認為「皇恩浩蕩」皇上就是真理，臣下焉能批評，文學則以為如今的風氣敗壞都是導源於這些不正確的觀念，並且反諷丞相史。

<孝養>

本篇是討論孝順父母的方法，丞相史認為孝順父母的方法是以錦衣玉食，而非外在的禮儀，文學則以相反的態度對之。

<刺議>

此篇只要是討論丞相史是否有參加討論的資格問題。

<利議>

此篇是標準的人身攻擊教本，兩方竭盡抹黑之能事，無恥之恥----無恥也。

<國疾>

此篇主要是針對國家目前存在的弊病而討論，雙方仍是各執一詞辯論不但沒有交集，且雙方各自相互攻擊，但文學卻指出了官吏的貪贓枉法的真相。

卷六：社會問題真相的探討

<散不足>

此篇是記錄賢良的「長篇大論」，內容列舉目前社會的種種弊端。

<救匱>

本篇之辯論焦點集中在如何治療「聚不足之病」，賢良認為官員與其子弟應親自做示範，不要買「五千元」的球鞋，如此社會上的弊端才可克服，大夫則認為儒生只會放空話，其提出的辦法不切實際。

<箴石>

本篇是丞相對於賢良、文學在辯論中屢出不遜之言而提出指責的言論，並且說明這些儒生當權也不會有救國之道，賢良則感慨君子之路窄。

<除狹>

此處在辯論君子之路窄的問題，大夫認為君子之路是否窄的問題是在於自身，因此根本否認君子之路窄的問題，賢良則認為只有以古代選用人才的方法才真正的可以「除狹」。

<疾貪>

本篇是以貪婪為主題來討論，大夫認為貪婪的是下級官吏且貪婪是出於他們的天性，故而上級官員也無法教導他們，賢良則認為俸祿低是下級官吏貪婪的主因，且「上樑不正下樑歪」，因此貪婪的主因在上級官員，治國之道在於培養好

的社會風氣，故應以教化為主。

<後刑>

本篇主要是討論對待刑罰的問題，大夫肯定刑罰的作用，主張以嚴厲的刑罰對待惡民，賢良們卻主張治國治民禮應以禮義教化為本，刑罰不是最主要的東西。

<授時>

本篇主要的辯論焦點在於農業生產與相關的貧富問題而展開的，大夫認為人民的貧困在於其自身的怠惰與奢侈，且朝廷對於農業是十分重視的，賢良則駁斥了朝廷對農業重視的說法，並且說明了當時農業廢弛的狀況，並且重申治國之道在於以禮為本，重視農業生產。

<水旱>

本篇主要是從水旱問題談起，繼而談到鹽鐵官營等政策，大夫主要是從規模經濟的角度來看鹽鐵官營的好處，賢良主要是從民營帶動競爭與進步的角度來看問題。

卷七：國家戰略問題與知識份子之責任

<崇禮>

本篇的主要討論焦點在於如何對待前來進貢的少數民族，大夫認為在接待來自各地的異族之時，應展示國威，而否定賢良的說法，賢良則以為應以「禮」來對待來自四方之民，此舉自然有風行草偃之效，賢臣對於國家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賢臣蠻夷必然降服。

<備胡>

此篇主要是以防備匈奴為題而展開的討論，大夫認為只有以「軍備之強大」才可振攝敵人，賢良們卻以為如此會導致民不聊生，因此其主張「以德服人」則敵人自然不敢來犯。

<執務>

本篇主要是討論到底哪一些事是當前必須立即去做的。

<能言>

本篇是討論言行的問題，大夫們認為儒生只會「空談道理」而不能實地的從事治理工作，賢良則認為儒生是「國之干城」，希望公卿們能採納其意見罷去阻礙民生鹽鐵等政策。

<取下>

本篇就向老百姓抽稅問題而展開辯論，大夫駁斥賢良關於「利歸於民」的主張，如此主張是忽略了君主與國家的利益，賢良則是以古代為例來說明其主張的正確性，因而提出治國必須奉行「仁義」。

到此為止正式的會議結束了，以下的部分是賢良與文學在御史大夫處所做的辯論。

<擊之>

此篇只要是以是否進擊匈奴為題而展開的辯論，大夫認為應繼續執行武帝的政策-----進擊匈奴，文學則主張應偃武修文與匈奴和親。

卷八：對匈奴問題的辯論

<結和>

本篇針對與匈奴和親是否有效而展開的辯論，大夫認為以往對匈奴的和親是錯誤的，因此武帝才會改採以武力征伐的戰略，而且其功績卓越，不可抹滅，文學則指出以往的政策並沒有錯誤，自從改採武力征討的戰略後，國家與百姓都深受其苦，秦朝的壽命很短就在於窮兵黷武、奴役百姓；朝廷應以秦朝為鑑，應恢復與匈奴聯姻。

<伐功>

大夫肯定了討伐敵人、擴充疆土的必要性，並指出匈奴現今未滅，就是因為一些臣民不出力，且反對朝廷政策的原因；文學則以反對對外征伐來反對桑弘羊執政有功。

<西域>

本篇就西域與匈奴的地緣戰略關係而展開辯論，大夫肯定征伐匈奴、聯絡西域各國、伐大宛等措施，並認為此舉將可孤立匈奴，文學則反對這一切主張，認為此舉只是勞民傷財。

<世務>

本篇主要是討論現在如何對待匈奴的問題，大夫認為匈奴貪婪，故不能主張「以德安撫」，應繼續加以追討，文學則主張應以德安撫，廢武功、取消戰備，用仁義引導匈奴，使其來歸。

<和親>

本篇就和親問題展開辯論，大夫反對和親，其主張是自古以來並沒有永世之盟約，且匈奴貪婪不能相信，更不能輕易撤除戰備；文學則認為征討匈奴帶來無比的災難，並且渲染「仁德」的威力，要用仁德感化他們。

卷九：對匈奴戰略與戰術問題的探討

<繇役>

本篇是由征伐問題談到人民的繇役問題，大夫指出武帝的征伐政策是正確的，因此徵人服繇役是正當的，文學則以一貫的態度認為「文德服人」才是長久的，因此反對朝廷的征伐政策，讓人民承受了過多的繇役。

<險固>

本篇是討論地理形勢對於保衛國家安全的作用，大夫認為擁有天時不如地利，因此為了保衛國家必須要建立城墉與關塞，且要做到常備不懈；文學則是老調重談主張以德服人，再大的城墉與再堅固的堡壘都不能保衛國家的安全，所謂「行善則昌，行惡則亡」，故保衛國家應以仁義為阻，而非以險固為阻。

<論勇>

本篇是討論與匈奴對戰時應該使用的戰術問題，大夫指出應以利箭強弩裝備部隊，用武力迫使匈奴降服，必要時也可以仿效「荊軻刺秦王」的方式來行刺單于，文學則認為自然險阻與武裝部隊不足恃，派人行刺的作法更是不足取，只有以「仁德」感化敵人才會降服。

<論功>

本篇是討論征伐匈奴是否可以成功的問題，大夫指出匈奴的許多劣勢，因而認為征伐匈奴是以「以義伐不義」必能成功，文學則指出了匈奴的諸多優勢故要將其征服不易，且重申其千篇一律的謊言----以德服人。

<論鄒>

本篇主要是大夫以鄒衍的「九大州說」來諷刺儒生的無知與見識狹隘，認為治國應像秦國一般有遠大的目光，有雄心壯志；文學則根本反對鄒衍的學說，且對秦朝的好大喜功之作法感到排斥。

卷十：德治與法治孰優？

<形德>

本篇主要是討論「以法治國」或是以「以德治國」，大夫等官員強調刑法在治國過程的重要性，認為「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無法國家難以為治，因而主張以嚴刑峻法治國；文學則譴責嚴刑峻法的運用，主張仁君應以行仁義，努力教化人民才是正途。

<申韓>

此篇主要是辯論德治與法治的問題，御史讚揚申不害與韓非等人的作為，強調以法治國的好處，因為真正姦脅之人才會被法所制裁，一般大眾反而因此得福，「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因此必須設置「明法」，頒佈「嚴刑」；文學則以為治國之道在於「信禮義」，重教化而矣。

<周秦>

本篇仍是以辯論禮治與法治的問題，雙方的立論仍不脫以上數篇的概念。

<聖詔>

如同前幾篇一般本篇仍是以德治與法治孰優為討論的焦點，立論依據仍不脫前幾篇的範圍與內容。

<大論>

本篇前半仍是對德治與法治孰優的探討，後半部則討論到孔子的地位問題，大夫對孔子多所批評，而認為施政應因時而易；文學則肯定了孔子的功勞。

<雜論>

這篇類似今日的「編後記」，作者桓寬對書中的人物做了一番評論，基本上其對於代表儒家思想的賢良、文學給予高度的肯定，對於代表政府的桑弘羊則給予「名為肯定，實為貶損」的評論，對於御史、丞相史則視之為目光短淺、阿諛奉承之輩，另外對田千秋閉口不言，以求容於當世的作法表示了不滿。

肆：讀後感想

(1)、《鹽鐵論》的價值所在：

依學者關紹箕所言《鹽鐵論》對於現代中國人有下列幾種重要意義¹²：

- I、它有助於我們瞭解西漢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思想文化。
- II、它開啟了中國古代朝野政策辯論的先河。
- III、它對中國今日之政治、經濟、軍事與思想文化仍有若干啟示作用。
- IV、它是一本活生生的辯論教材---有正面、也有負面的作用。

(2)、《鹽鐵論》代表著西漢政策的重要轉折：

這本《鹽鐵論》是漢代最詳實的儒法衝突的紀錄，且其辯論的要點更不只有財政政策而矣，舉凡文治與武功、農本與工商、仁義與功利、刑法與道德等均是這次會議所討論的範圍，有此可見這次會議的討論範圍之廣泛，再加上大將軍霍光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的權力鬥爭，更使得這次會議異發顯得重要¹³，也因為如此這本《鹽鐵論》因而成為研究西漢中葉政治、社會、經濟的一部巨著¹⁴。

¹² 關紹箕著，“《鹽鐵論》與《貞觀政要》的後設語言現象”，輔仁學誌（文學院），第二十五卷（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總 104~116。

¹³ 蕭公權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九年十月，第六次印行），頁 290~291 與陳再明著，古今人物逍遙遊：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三刷），頁 149~153。

¹⁴ Tao Tien-yi “Yen t'ien lun (鹽鐵論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as a Historical Source”，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卷，第四本（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頁 743~777。

(3)、由政策設計(policy design)與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的角度來分析：

大體而論，以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大員基本上是從政策之本義與政策的結果來贊成繼續武帝以來的一些政策的，相反的，賢良、文學這些儒生卻是以政策執行中所產生的缺失和儒家的哲學原理來反對武帝以來的一些政策，當然不可否認的一點是雙方的論述都非常的正確，但也十分的偏頗，雙方在辯論之中鮮有共同的交集也不是甚麼意外之事¹⁵，撇開那些迂腐的儒生不談，為甚麼像桑弘羊這樣的幹練官員會忽略掉政策執行中所產生的弊病呢？或者視弊病而不見呢？最主要的原因便在於專制政權所特有的習性而矣，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與官員的所作所為均有人民大眾的監督且必須定時的接受人民的信任投票，故一旦有任何缺失之時人民便不會如同羔羊一般任人宰制，但在古代的皇權政治之下，人民就如同豬羊一般是任人宰割的，就如同機器一般沒有尊嚴更沒有地位，人民只是國家的附屬品，自然這些政府大官在做任何考慮之時就有意忽略人民的意願了¹⁶。

(4)、有關對外政策的討論，顯示出賢良、文學的無知與天真：

綜觀《鹽鐵論》全文中有關對外政策辯論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御史大夫或是賢良、文學的立論都有所偏頗與不足，但就賢良文學的立論來說，一味的以仁義道德為盾牌，則將事情過於簡單化，在當今二十世紀之末葉，「經濟」的優勢仍然不足以代表一國之強大，更何況是對於尚未進入資本商業的社會呢？一個國家的「力量」究竟還是要靠軍備來顯示，需有充分的軍備力量才有資格來談和平，這是稍具常識的人都能夠瞭解的，所以賢良、文學一味主張以德服人，甚至主張連邊境軍備都一併撤除，就不免是空談的言論了。

(5)、社會風氣的問題：

在這次的政策辯論中，賢良、文學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社會的奢靡風氣對於國家經濟行為產生的影響，雖然《管子》一書對奢靡曾給予若干正面的評價¹⁷，但是，觀察其主要的用意在於利用這些有錢人的消費以刺激經濟的生產，

¹⁵ 依吳定教授言，政策的制訂過程可分成政策問題的提出、政策規劃 (policy formulation)、政策合法化 (policy legitimating)、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 (policy evaluation)，由此可知儒生與桑弘羊的辯論乃是在兩個不同的系絡 (context) 中陳述其理由，因此雙方辯論中鮮有交集乃屬正常之事，見吳定著，公共政策(全) (臺北：華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二月)。

¹⁶ 徐復觀著，兩漢思想史：卷三 (臺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版)，頁 170~190。

¹⁷ 《管子》的作者認為當社會的經濟處於低迷之時，富有的人的奢靡行為不但不能禁止還應該給予高度的肯定，認為這些行為會對於社會的經濟生產產生正面的作用，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

以便帶領國家的經濟走出低迷，在此情形之下奢靡才會有其正面的意義，而賢良、文學所指的是這些因為推行鹽鐵官營等政策而搜刮了大批民脂民膏的權貴，不但自身奢靡不說，連帶的使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改變，農民因過重的稅賦放棄了耕種而逃亡，社會因此放棄了正面的生產，國家的正常經濟生活產生了重大的轉變，因而奢靡不再是正面的功能，反而是一罪惡的深淵，而在辯論之中，以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大員，不但沒有悔改之心，反而大聲嘲笑貧窮的人沒有資格談論國政，試問天理何在？或許正因為如此專制的皇權才會在中國消失的吧！

(6)、從權力結構面談起：

就如同文章標題所揭示的一般，這次會議與其說是政策的辯論，還不如說是一場內廷（霍光）與外廷（桑弘羊）的權力鬥爭，霍光只是想利用這些儒生來達到其侵奪外朝（外廷）權力的目的而矣；就在會議結束後一年桑弘羊就因為涉及謀反事件而被送上斷頭臺，從此霍光權傾內、外廷（朝），此舉更種下了漢朝滅亡的一重要原因。

若只從權力結構面來看，一個王朝的權力結構大致上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是以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面來看，另一個是以人的角度加以剖析。

首先，筆者先從中央與地方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交通甚為不便的古代中國，為了應付各地方的特有事件及變亂與外患的要求之下，中央勢必要將某些權力下放給地方，在下放權力的同時又要保持中央政府的控制，因此在權力的收放的藝術就成為歷代王朝的存亡的重要關鍵，若是過份將權力下放給地方，則會容易產生類似現代政治學術語中葉爾欽效應（Yeltsin effect）¹⁸，如東漢末與唐朝末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若過份的「強幹弱枝」，也只會使得中央政府疲於奔命如宋朝，因此如何維持中央與地方之權力關係就成為歷代政府的重要課題了。

其次就人之關係而論，若以皇帝為中心的話，整個帝國的權力結構可以大致上分成五層，一是為同心圓中心的皇帝，二是皇帝外其他的皇親國戚，三是以宰相為代表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官員，四是地方上的地主或其他有錢有勢的人，五是儒生，若一個王朝想要能長治久安，則必須要讓除皇帝外的另外四層相互牽制，而且不能使任何一層出現「獨大」的情形，而這次的鹽鐵大辯論就是代表想要打破

想史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初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九月），頁139~143。

¹⁸ 所謂的葉爾欽效應是指由於地方與中央在人口與面積之比例上，過於相近；因此若是地方首長的權力基礎過於強大且中央政府的權力基礎有所不足時，則容易發生地方權傾中央。

者種權力牽制的事例，辯論後霍光權傾朝野，其結果自然會危害了王朝的生存與發展。

伍：結論

(1)、參與辯論的雙方各代表著人類經濟生活中對於政府角色的不同看法：

撇開這次會議中討論的其他議題不談，而專就這次會議的重點---經濟的官營與私營之爭而言，它代表了兩種經濟思想在人類社會中的鬥爭，儒生（也就是賢良與文學）所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與桑弘羊所主張政府管制的經濟思想的對抗，在人類有政府以來這兩種經濟學說（或思想）都一直是經濟思潮的主角，而哪一種學說才是真理的呢？事實上一直都沒有正確的答案，在儒家思想、古典經濟學者（Classical School）、新古典經濟學者（Neoclassical School）與貨幣主義者（Monetarism）、供給學派（Supplement School）甚至於後來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在這些學者眼中只有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政策才是能達到經濟最適化的政策¹⁹，但是此種經濟政策的不良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十九世紀西歐國家工人階級的悲慘狀況、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與戰後在新興國家所推行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政策的失敗是無法抹滅的²⁰，為了應付這種危機許多經濟學者如凱因斯（John M. Keynes）便主張運用政府的力量來解決這些問題²¹，政府介入經濟事物在初期是好的，但是往

¹⁹ 有關儒家的經濟思想見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初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九月），頁 39~70，91~106，所謂古典經濟學是指由亞當·斯密（Adam Smith）、馬爾薩斯（T.R. Malthus）及李嘉圖（D. Ricardo）三人建設確立於英國，嗣由若干學者繼承祖數，以迄約翰彌爾（J. S. Mill）的一個學派，有關古典經濟學的理论見胡寄窗主編，高安邦校訂，西方經濟思想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四月），頁 83~162，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見胡寄窗主編，高安邦校訂，西方經濟思想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四月），頁 217~274，有關貨幣主義的經濟思想見胡寄窗主編，高安邦校訂，西方經濟思想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四月），頁 487~497，而有關供給學派的觀點見塔戈特·墨非（Taggart R. Murphy）著，李巧云譯，日圓神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五月），頁 122~148，所謂的震盪療法本來純粹是醫學術語，是對精神病人的一種電休克療法，1980 年代後期，被經濟學家借用來比喻治療經濟病症所採用的激烈措施，以上見薩公強著，“薩克斯及其震盪療法”，經濟前瞻，第九卷第四期（八十三年十月），頁 115~118。

²⁰ 有關古典經濟學與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理論的缺失見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聶振雄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四月），頁 1~98，約翰·蓋伯夫（John K. Galbraith）著，孫成煜譯，群體貧窮本質之探討（臺北：美國在台協會今日世界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一月），頁 15~28 與魏鏞等著，公共政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八十一年月，再版），頁 351~363。

²¹ 有關凱因斯的經濟思想與主張見凱因斯（John M. Keynes）著，陳林堅等譯，就業、利息和

後帶來的卻是貪污、無效率與浪費²²，且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研究顯示政府的介入經濟事物並沒有帶來更好的經濟發展²³，到底政府在經濟事物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我相信這個問題將會一直伴隨人類生活一直繼續下去。

（2）、從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中談起：

若只從這次辯論中的主角----鑄幣權、均輸與平準制度來看，其實桑弘羊所設計的政策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今日都一直為現今政府所遵行，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控的鑄幣權的設計，但為何在當時卻屢遭民間人士所抨擊呢？除上文所提及的專制皇權的特性之外，本段更要提出另一個更為重要的觀念，即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配合問題。

資本主義（capitalism）之所以在西歐與北美運行不逾，除文化的因素²⁴之外更為重要的原因即在於政治制度的相互配合，若沒有民主政治的推行資本主義想要運行的順暢便是十分困難的²⁵，有了民主政治對私有財產的保障與對政府當局的制衡力量，經濟事物才有可能繼續蓬勃的發展，在專制皇權之下任何事物都沒有保障，因此無論立意多麼美好的政策，最後都會因為政治制度的不能配合而作罷，「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正是最佳的文字，在中國的歷史上改革多不能成功的原因就在於立意良好的政策都因為政治制度與環境因素的不能配合到最後只好作罷，俗語云：「徒法不足以自行」或許正是這種寫照吧，亞洲金融風暴（Asian Financial Crisis）²⁶的發生有部分的原因便是以上所言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不能配合所產生的²⁷，由此可見兩者的關係之重要。

貨幣的一般理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初版四刷）。

²² 陶在樸，「企業倒風浮現 誰能救臺灣經濟？」，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版十五。

²³ Vito Tanzi and Ludger Schuknecht, "Reforming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33, No.3 (1996 September), p.p.2~5。

²⁴ 有關文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見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宛蓉譯，誠信：社會德行與繁榮的創造（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導讀頁3~6。

²⁵ 索羅斯（George Soros）也表示過類似的意見，見索羅斯（George Soros）著，聯合報編譯組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頁XXV。

²⁶ 所謂亞洲金融風暴是指，發生於1997年7月2日泰銖由一籃通貨（a basket of currencies）固定匯率轉換成管理式浮動匯率，因而導致泰銖當日大幅下挫19.5%的貨幣危機，進而影響到經濟體質與泰國相近的印尼、馬來西亞與菲律賓，並且波及到經濟體質健全的臺灣、香港、新加坡，最後又影響到東北亞的南韓與日本，甚至全球的其他國家，由於此次金融危機受害的國家多為亞洲國家，故又名亞洲金融風暴。

²⁷ 金榮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七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七年一月），頁1~14。

(3)、對於「獨尊儒術」的看法：

從鹽鐵會議雙方的辯論中我們就可以瞭解到漢武帝獨尊儒數的成績，連桑弘羊----這位商人之子都能對於儒家經典朗朗上口，由此可知武帝獨尊儒術的成效，但是，話說回來從賢良、文學的發言中我們便可以看出獨尊儒術對於學術的傷害，在有關對外政策的辯論中，賢良、文學除了「仁義道德」之外都提不出任何有意義的方針，這就說明了一旦學術「一元化」之後，儒學反而因此喪失了活潑與躍動的機能，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或許有其時代的意義，但是一旦學術依附了政治，只能成為政治的裝飾品，沒有其他學術的刺激，儒學最終只有越趨僵固，想要使儒學再次躍動起來只有靠外來的刺激----佛教與英法聯軍了²⁸。

(4)、對匈奴戰爭的看法：

自中華民族有歷史記載以來，與北方的游牧民族之間可以說是衝突多過於合作，一直到清朝康熙帝用西方的大砲平定為止，前後長達千年之久，在這千年之中，中華民族為了此一地區不知投下了多少的人力與金錢，也不知有多少的王朝是因為對北方異族的征戰因而導致其赴亡，漠北的大沙漠也許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但是，就另一方面來說，中國的種族與文化中心主義或許才是造成此一禍害的元凶；當環境的條件發生了變遷，使得游牧與農耕的民族產生了生存的壓力必須向外拓殖之時，中國卻走了與西方不一樣的道路，西方國家透過平等貿易或是其他非戰爭的手段來達到彌補生存條件的欠缺，但中國卻是以文化種族中心主義來思考，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一切，結果是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使中華民族承受了莫大的悲哀；筆者以為如果在這問題上中國歷代的王朝能採行西方國家的方法，或許中華民族會有另外一番不同的發展風貌。

²⁸ 盧瑞容，“西漢中期對匈奴政策論爭的考察----以《鹽鐵論》為中心的討論”，宜蘭農工學報，第十四期（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 137~158。

陸：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籍

- 1、吳定著，公共政策（全），臺北：華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年二月。
- 2、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初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九月。
- 3、陳再明著，古今人物逍遙遊：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初版三刷。
- 4、徐復觀著，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版。
- 5、盧烈紅注譯，新譯鹽鐵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七月。
- 6、薩孟武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增補六版。
- 7、蕭公權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九年十月，第六次印行。
- 8、胡寄窗主編，高安邦校訂，西方經濟思想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四月。
- 9、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宛蓉譯，誠信：社會德行與繁榮的創造，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 10、索羅斯(George Soros)著，聯合報編譯組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 10、約翰·蓋伯夫（John K. Galbraith）著，孫成煜譯，群體貧窮本質之探討，臺北：美國在台協會今日世界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 11、凱因斯（John M. Keynes）著，陳林堅等譯，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四刷。

- 12、伯瑞 (Leon P. Baradat) 著，陳坤森、廖揆祥譯，政治意識型態與近代思潮，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 13、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著，聶振雄等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四月。
- 14、塔戈特·墨非 (Taggart R. Murphy) 著，李巧云譯，日圓神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 15、魏鏞等著，公共政策，臺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八十一年月，再版。

二、中文期刊

- 1、金榮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七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七年一月)，頁 1~14。
- 2、盧瑞容，「西漢中期對匈奴政策論爭的考察----以《鹽鐵論》為中心的討論」，宜蘭農工學報，第十四期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 137~158。
- 3、關紹箕著，「《鹽鐵論》與《貞觀政要》的後設語言現象」，輔仁學誌 (文學院)，第二十五卷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總 104~116。
- 4、薩公強著。「薩克斯及其震盪療法」，經濟前瞻，第九卷第四期 (八十三年十月)，頁 115~118。
- 4、Tao Tien-yi 「Yen t'ien lun (鹽鐵論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as a Historical Source」，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卷，第四本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頁 743~777。

三、英文期刊

- 1、Vito Tanzi and Ludger Schuknecht，「Reforming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 Countries」，Finance and Development，Vol.33，No.3

(1996 September), p.p.2~5。

四、中文社論

- 1、陶在樸，「企業倒風浮現 誰能救臺灣經濟？」，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版十五。